

書評論文

讀左景權著：《司馬遷與中國史學》

(Dzo Ching-chuan: *Sseu-ma Ts'ien et l'historiographie chinoise*,

Publications Orientalistes de France, 1978, V+356 pp.)

柳存仁

湘陰左東侯先生（景權），住法國逾三十年，經常在巴黎國家圖書館校閱敦煌卷子，多所貢獻，治敦煌學者多知其入。其實左君博瞻，不止一端：其研治希臘文學，神居胸臆，思接千載，近日遂有法文《司馬遷與中國史學》一書問世。蓋左君讀《史記》與希臘史家希羅都突司（Herodotus 紀元前五世紀）之著述多年，於後者能從其原文及若干德文考證之書籍入手。浸沈既久，動極神源，將有馬遷與希氏兩大家史學比較之宏著，《司馬遷與中國史學》之書蓋其緒餘土苴而已。然其鎔範所擬，已頗使人窺其意象之闊，抑揚之善。其萬途競萌，聯類不窮，如舉 J. E. Powell: *Lexicon to Herodotus* 與婁機之《班馬字類》並說（頁 244），即為一例。正所謂通百慮於一致，會異旨如肝膽也！竊嘗納讀其書，翫味之餘，微有管窺之見，試為愛讀其書者陳之：

司馬遷之《史記》，自西漢宣帝時開始以單篇為人傳鈔誦讀，至十世紀末（北宋太宗淳化間）始有刻本，其間增改竄亂，習非成是者，固所難免，甚且有改變原著體例之處，研究《史記》板本書錄者，類能言之。清代乾隆以降，史家尤多以校勘彌縫遺失為能事。然不論其錯脫譌衍之程度如何，後賢之得以董理考覈匡謬者奚若，史公之最大貢獻，與後世之紀事本末體一類著作（南宋孝宗時袁樞仲《通鑑紀事本末》始開其端，詳見《宋史》卷三八九「袁樞傳」）迥然不同者，為後者之編集為苦史籍之浩博，乃「區別其事而貫通之」（《宋史》卷三八九語），而史公之體製：紀、傳、書、表，包羅至宏，其間又復有如章實齋所言「各有心裁家學，分篇命意，不可以常例拘牽」（《文史通義》，外篇一，「史篇別錄例議」）者。是紀事本末諸書，雖在編年、紀傳二者之外，別為一體，較為通俗易讀，然於史遷（甚至司馬光《通鑑》）隱微難喻周變求通之

意，微失厥旨，稍見其奄陋鄙塞矣。羅馬政治家兼學者文豪之西塞羅(Cicero, 106—43 B. C.)稱希羅都突司為史學家之父，兩千年來西洋學者概無異辭。太史公之書，雖在《尚書》、《春秋》、《國語》、《左氏》之後，其體製之精，用力之勤，影響後世之大，亦可稱為中國史學家之父而無愧色。抑左君之所以樂於用希氏之著述共史遷互相比較者，愚意其當指兩者之提挈綱維，備總情變之創造精神，而不止第觀其迹也。若言其迹，兩者著述之間固有其相似之處，亦有相異處。《史記》之體製一部分為中華民族立國以來至漢代之通史，而其詳則漢代史也，亦即以漢初史家立場為敘述，當時中國人所見之歷史為如何情況之歷史也。希羅都突司為著名之波斯戰爭歷史之希臘作者，其人約遲於孔子六七十年生，其所敘述之歷史（亦可直譯其名為《史記》）蓋一部分為敘述波斯、希臘間之戰爭，又轉而記述波斯帝國之長成，其地理，其社會組織及歷史。蓋波斯帝國之風貌不得而詳，則其所敘之波希戰爭亦必平淡，如浮光掠影而無力量也。波斯大帝國包含各種民族，而『漢興以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款塞，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史記》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語），亦正實現漢朝當時人心目中之大一統理想。希氏之書為戰爭史而加敘波斯帝國之興，史公之書為『漢興五世，隆在建元』之當世紀錄，而不得不追述五帝以降至於秦變遷之事故，兼及貨殖生產文物體制內外交通發展之迹。二者之組織，於如此之處皆有創造性，非因襲成章者比。此其或可資比擬者一也。更有可言者，希羅都突司嘗旅行埃及、利比亞、敘利亞、巴比倫，更北至多瑙河及黑海北岸，然其所敘之戰爭歷史，西洋史家尚頗以為未足。太史公年『二十而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闢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游踪所至，更及粵、楚，以至巴蜀以南西南各地。顧亭林《日知錄》卷二十六，「《史記》《通鑑》兵事」條云：「秦、楚之際，兵所出入之塗，曲折變化，唯太史公序之如指掌。……蓋自古史書兵事地形之詳，未有過此者。」顧亭林亦旅行關塞留心兵事之人，是史公之所詣，或有愈於希羅都突司者矣。抑有進者：希氏之《史記》於正面敘述之外，往往有枝節離題之語，似與後世史家之幢節精嚴者不同，易為後人所詬病。此類情形太史公《史記》亦有之，《左傳》亦有之。然希氏及史公之原書皆以其文字之美、意境之遠為後世讀書人所傳誦，其他史家之著作無如是之思表纖旨，文外曲致也。姑以《史記》言之，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卷二言「劉邦項籍俱觀秦始皇」，「劉邦藉項噬項」，及「漢惟利是視」三條，所指皆極確當，然其所以能令人有類此之觀察者，則以史公之所敘看似枝節離題之語，實多頰上添毫之妙也。踵乎類此者而言之，希羅都突司之《史記》所述之若干小故事，或有與實際發生之時間衝突不得並立者，而治西洋古史者仍篤信其傳統而稱譽之，至少不以其為有意偽造。如以近數十年治中國古史者之態度衡之，則希氏之文字其或有時、地、人相衝突者，無不悉可以嗤之以鼻者矣。太史公之前有《尚書》、《春秋》、《國語》、《左傳》，希羅都突司之前韻文則有荷馬，散文則有 Hecataeus of Miletus，亦如耶穌之前有施洗約翰，皆前

驅也，而希羅都突司獨以史學之父稱者，謂其著述能有有機性之組織，自入典雅之懿，而獨多自然渾成之趣也。治史學者，苟能恢復古人本來面目，不以後世之管窺測前人，則希羅都突司自希羅都突司，史公自史公，皆可平理著衡，照辭如鏡，而可為前人之知音矣。由是觀之，左君治《太史公書》，而倦懷於希羅都突司之業績者，豈不以兩賢之史學，各有其獨創區宇經緯彌綸之處，皆足以詔後世而永厥成也耶？

左君之書，區為兩編。上編之篇幅較少，僅泛論中國史學之傳統，藉以說明太史公書在中國史學上之重要地位，然其書於史遷以前之史書與資料，析論甚精，如《尚書》、《春秋》、《左傳》、《國語》、《秦記》（案，《史記》卷十五「六國表序」云「太史公讀《秦記》」，「秦既得意，燒天下詩書，諸侯史記尤甚，……獨有《秦記》，又不載日月」）、《竹書紀年》、《山海經》、《穆天子傳》、《楚漢春秋》、《世本》，每書皆有適當之解釋，旁及近人之研究著述，及《史記》與此一書之關係。讀書者用之以共 Charles S. Gardner 著 *Chinese Traditional Historiography* [此書為哈佛大學《史學叢刊》第十一種，1938年原刊本頗多謬誤，1961年修訂本為楊運生先生（聯陞）所補正]，金靜庵（毓黻）之《中國史學史》等書相比較，當可審見其詳畧及需要之不同，而皆有異於開書單性質之簿錄。需要所及，著者更徵引近歲中國國內考古發掘之成果以證其說而補不足，如敘《秦記》則據一九七六年《文物》第六期文字而述湖北雲夢秦簡之發掘（頁30—31），論《戰國策》則引一九七五年《文物》第四期馬雍先生所撰「帛書別本《戰國策》各篇的年代和歷史背景」（頁29），皆其例也。一般言之，中國高明學者之著書，即或旁徵博引，亦必於其所徵引者，先作適當之選擇。故其所論列之參考書，必有其所以必需論列之故，寧缺毋濫。此著述界之公例，非如近年西方淺人之治中國學者，每拈一題，輒先廣搜博求，並其三四等無關宏旨粗製濫造之材料，即圖書館亦難求備者，牛搜馬勃亦復兼羅而並蓄之。況復沾沾自喜，以為能得他人所未曾有之資料，而後可以智珠在握。不知博覽之為難，而博觀之後，又復擷其精華而棄其糟粕，如左君本書上編不過百頁之概論，更為難著墨也。除論《太史公書》本身外，上編更旁及列傳與文學，正史性質，史書之重複撰述，編年體與記事本末體之史籍，《三通》、《會要》、及其他在文化史方面有關之著作，並敘述記注與撰述之不同，皆所以為下編之論司馬遷者之先導。下篇之主要內容先敘古代之文化背景，爰及漢代之社會學術，遂以《史記》卷一百三十之「太史公自序」及《漢書》卷六十二「司馬遷傳」、《昭明文選》卷四十一所收之「報任少卿（安）書」為解釋史遷本人之思想淵源、學問背景，及史家襟懷之第一手材料；其說明側重與剪裁之處，用心至細。「太史公自序」與「報任少卿書」並加逐譯，頗能改正前人之失（見下文）。自漢代以迄於今，二千年間論列《史記》之體例、內容、流傳板本、注釋、考證之著作不可以千百數，左君多所瀏覽，於下篇中頗多加以評述。古今中外之書，何者可從，何者不可從，或者某書某文其優點為何，其闕失為何，作者皆持平衡之論，使人灼然見其得失，非所謂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者也。至

於西文著述，讀者如據 Timoteus Pokora 在 *Oriens Extremus* 中所刊之“*The Present State of the translations from the Shi Ki*”(8, 1962, 2, pp. 154—73)及其為 *Mémoires historiques* 第六冊所收之“*Bibliographie des traductions du Che-ki—chapitres 48—130, non traduits par Edouard Chavannes dans les tomes I—V des Mémoires historiques*”(1969, pp. 113—146)兩目所錄各篇共左君書所嘗引用者而比較之，則知左君雖非逐一加以論列，其較重要文字，除俄文者外，多已涉及。至於中、日文著述，作者所為根據參考者，多見於賀次君先生所編之《史記書錄》（北京商務印書館，1958），水澤利忠之《史記會注考證校補》，及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一、二所所編《史記研究的資料和論文索引》（科學出版社，1957）。賀書著重板本，自六朝抄本殘本、敦煌卷子，下至宋、明、清刻本，以迄一九三六年北平研究院排印顧頡剛、徐文珊標點本、多所羅列，且多予以校勘方面之評價。左君之書本身非書錄，然已能擇善而從，予學者以基本性之啓發。後書係索引性質，其分類編列之資料除有關《史記》全書及各個部分研究、司馬遷生平及學術貢獻者外，更廣搜稿本及未見傳本為之目錄。其尤可喜者，為收入有關《史記》而非專門研究《史記》之著作（例如王念孫《讀書雜誌》內收「《史記》雜誌」六卷，洪頤煊《讀書叢錄》卷十七至十八之類），及唐、宋、元、明筆記中有關《史記》之文字條目（例如洪邁《容齋隨筆》卷一「《史記》次第」條，葉適《習學記言》卷十九「《史記》五帝三代本紀」條之類），皆搜求甚密。惟所收外文專著及外國學術期刊中有關史記論文，則所獲似不及搜羅本國著作之周全。然左君之論斷，要在擇其羣犖大端而析論之，非徒囿於前人之見解者。比類而求，亦可謂能運工具書之所長矣。

作者此書雖論司馬遷，然以其著眼所在，固在中國史學，尤在評斷司馬遷《史記》以降之中國史學傳統。因此，作者於字裏行間，亦不能不流露其對中國近世治史學者之態度，以及對一般歷史研究之瞻望。惟作者此書係用西文寫作，其閱讀對象主要為法國學者，旁及歐美學人，是以作者之論列，往往欲薪其西方讀者先畧知中國史學本身之源流，而不樂侈談近百餘年來西方學術之所謂新史學，或國內近六十餘年史學界之震盪波潮。然以愚觀之，本書作者雖頗引柳翼謀（詒徵）諸先生之說，作者實非近賢所擬為『記誦派』者可比。（『記誦派』之名，見錢賓四先生《國史大綱》「引論」，謂『傳統派主於記誦，諳熟典章制度，多識前言往行，亦間為校勘輯補』者也。）反之，作者出入西方史學之林者數十年，精究英、法、德、希臘文字，其於目前西方漢學界之治中國歷史者，胸中固無涇、渭之念，且嘗飽飫古代希臘、羅馬文化之英華而受其薰陶，然亦非人云亦云，而無所抉擇。是以作者之治學態度，質言之，蓋從中國史學傳統出發，深入理解西方史學之傳統，而又欲以其所理解者反照今日世人（不只中國人）之研究歷史之態度是也。是以吾人欲知其然獨異之故，及其見解是否合理，似當仍從近百餘年來西方史學界之變動諦觀之：

歐洲近代之史學，其特重客觀的及科學的研究，肇於十九世紀時對於文藝復興以還

舊史學之反動，而其發端之緒，更早淵源於十八世紀間，歷百年動盪而後有客觀史學與科學的史學名相之建立，而向慕自然科學重系統、好推證之思想又復揚其波也。從史學源流之發展言之，如下文所述，此時期之所謂客觀與科學亦非有純全完善之理想，其流變之所及，但以爲歷史事物亦復如自然科學事物者然可作實驗研究，且可由某一現象推斷其下一現象，預測未來而加以控制，甚且有先驗之定律與法則。此實一蔽端也。然在此以前，舊史學之偏差則爲過分重視文學性質之材料及同時代人物對事物之解釋，且既立一說，則世代相襲不替。又過分重文辭而不重視事物之真實性，於有歷史價值而比較乾燥之材料如文書、簿錄、供詞之類，注意者寡（如十九世紀初 Augustin Thierry, Amable Barante 之重想像），而其看重道德的觀念，則吾《春秋》以還之所謂褒貶也。新史學家之客觀或科學的衡量與審度，容或亦有誇大之處，然其流風所及，則細密研究之發展及與之相關之其他範疇之學問亦開始對歷史學發生重要之影響，而史書之詮釋箋疏，索引之開創，猶其餘事。平心論之，歐洲近代史學之發軔，於舊學之積重難返，雖未能拉枯摧朽，其有所建樹，亦未嘗不可壁壘一新。

新史學之極致，爲提倡以經濟條件爲研究歷史發展之重要法則。然在物觀派史學成立發展之前約百年，思想家受科學之薰陶，於有形之物質之重要性，先已不復輕視。例如法國之哲學家及心理學者狄·貢第拉（Étienne Bonnot de Condillac, 1715—1780），其研究人性，以感覺爲主。雖其說尚不廢靈魂，然感覺者，物也，有具體事物可資觀察與考驗者也。又如貢朶塞（Marquis de Condorcet, 1743—1794），爲由數學家出身之哲學家，嘗著《概論》（*Esquisse*）一書敘論人類心靈進化之層次。其書頗有數學傾向，有類乎邵雍之《皇極經世》。所言進化至第十期，則世界將無國界，無階級，個人之發展益趨完善，德智體俱健全，則康有爲之《大同書》不異也。受貢朶塞及經濟學家特果（Anne Robert Jacques Turgot, 1727—1781）之影響者，則有孔德（Auguste Comte, 1798—1857），而生人類之進化自神學而玄學而科學之三階段想法。孔氏著《實質哲學》（*Cours de philosophie positive*）三卷，論學術之孳生演化，謂始則有數，由數學產生天文，推天文而知物理，物理孳生化學，由化學而生物，由生物而研究社會學，社會學又至崇法制，重興革，而可臻於治術之全。孔氏又主張天主教會若去其神權設教，而代以社會學家之嗜口宣講，則社會棟梁不替。英國之小穆勒（John Stuart Mill, 1806—1873，蓋 James Mill 之長子），思想家又經濟學者也，嘗著專書評孔氏，以爲其所論學術演化之部分不爲無見，而改組教會之說則未見允當。小穆勒亦精植物學，其思想亦受孔德乃至狄·貢第拉之影響，至其實事求是，重證據，則幼年已飽飫家庭教育之薰育，可無申論。自狄·貢第拉之卒年至小穆勒之卒年約百年間，物觀派史學之基礎已若映若現，學者雖或猶豫於傳統史學與三段論法間，即思想家之論調亦不能脫玄學甚至神學之痕迹，然思想之遞嬗變化，往往若是。見微知著，即後世讀書者亦難悉窺其全，管窺所及，惟幸其不致厚誣前人而已。

然以物觀為新史學，亦不過史學範圍中之一部門而已。其持相反之論調者，雖未能悉蔑視物質存而不論，然恆以為物質為固定的、靜的，而歷史之演化則為變化的與發展的，而別為主張。早如義大利之史官維科（Giambattista Vico, 1668—1744）著 *Scienza nuova*（此書最後版本成於1744年），主張史學當以史為中心，而以有系統之社會科學為其發抒之另一面。其說更重視語言學，以語言為研究史籍之基本工具，而建立歷史哲學，則所以確立真理。是其說不排斥社會科學，亦所謂擴大史學視野範圍者也。維科歿世之年，普魯士人翁·赫得（J. G. von Herder, 1744—1803）始誕生，其人為路德一派之神學家，著《人類歷史中之哲學觀念》（*Ideen zur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 der Menschheit*, 1784—91），頗受文學家歌德之影響，主張時間、地點及民族性為研究史學之要素。至其亦以語言學為史學之重要成分，則受哈曼（J. G. Hamann）之影響者也。至此以還，而物觀史學派所重視之辯證法之創立者黑格爾（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1770—1831）出。黑氏之辯證法，本承自希臘哲學家及康德，但康德之思想受物理科學之影響，而黑格爾則揚棄之，又以為心智之觀念蓋不止感覺，是其說與法國狄·貢第拉之僅重感覺者相異。又黑格爾雖有辯證法，然其主張有神，復有精神，且有若干處與佛學之見解可以相通，是以以經濟為研究歷史發展之重要法則之說非至馬克思（Karl H. Marx, 1818—1883）、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 1820—1895）之學說問世也不能究明。易言之，馬氏、恩氏之著述出，其影響於史學界之所以較其前人為重大者，一以馬氏自有其史學方法，如一八五〇頃所著論一八四八年歐洲盪起之革命諸文字，迥與他人不同，一則以馬氏一派之學說，言歷史法則經認識後可以預見未來之變化，因而更可以有行為而促其實現。此後者所指之行動，實與普通史學範圍僅論列過去之事物者非一端，姑不置論。若就史學範圍，試加析論，則知物觀史學者非不主張思想能影響歷史，但謂思想之構成，則不能不受經濟發展及外界事物之支配。馬氏之故世去今將近百年，百年以來，世事變替多端，而思想界之震盪衝擊，尤甚於其他具體之事物而復影響於具體之事物。後世學者綜合此百年來世界發生之變化，而特就經濟因素著眼者，多謂馬氏卓識，其學說固已掀起人類歷史之巨大變動。然又謂物觀派史學者之主張，但言經濟事實為改變思想、制度、法律、政治、宗教等所謂『上層建築』之因，而不言經濟事實亦可能為上列所舉各項事物發生改變之果。因果迭替，此起彼落，此落彼起，而心智之可能有其自然之活動，似亦不能完全忽畧。且不論在何種社會中，技術之改進，固可紀錄、可傳授學習，其成果亦有可預期者。是以物觀派史學至少在其以技術之進步為文化及制度發展之重大原因一點上，影響實及於各派之社會科學，舉無異辭。此說今人雖以為淺而易識，若推溯至往古，則如《周禮·考工記》之記錄技術之實，司馬遷太史公於《史記》七十列傳中特述「貨殖列傳」皆不可不謂有千古巨眼。綜合前文所論，近世歐洲之新史學於客觀的科學的一派史學（其發展至極盛則為物觀派史學及其支流）及與之相反且比較重視傳統與心智活動之一派舊史學皆嘗兼采，而復謀有以懲其蔽。其不免

於過去舊史之業績中覓求可能發見之新啓示者，則以歐洲之文明實原於希臘、羅馬。欲求歷史生命之延續與光大，舍是亦復奚求？雖然，其事千頭萬緒，事與事糾結，心與物交映，非可以據一偏而概其全者也。如小穆勒，前所言十九世紀中葉英國之思想家又頗崇狄·貢第拉與孔德之學說者也，其人八歲即飽讀希臘都突司之《史記》全部，吾人固不能謂其於希臘舊史無見識。義大利史學家克魯司（Benedetto Croce, 1866—1952）主張歷史之研究不止為歷史本身，且當進一步及於人類一切經驗之最大極限。德國思想家斯潘格勒（Oswald Spengler, 1880—1936）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著《西方之衰落》（*Der Untergang des Abendlandes*），雖不為傳統之史學家與哲學家所喜，然其書實有新意。受克魯司影響者，如英國之柯靈渥（R. G. Collingwood, 1889—1943），謂歷史者，通過今日人類之思想，以說明過去人類之思想者也，故柯氏又嘗於其《自傳》中言二十世紀之哲學，應共二十世紀之史學核算，而後知其成數。其縱論史學，則言人類本先有感覺而無觀察，次有觀察而心拂意亂，其勢必反照而後可得一清明之心胸。此所言大清明之意境，蓋非如湯恩比（A. J. Toynbee）所主張擴大人類活動之各種定型，與仔細觀察複雜之文化搏合不能也。湯氏著《歷史研究》（*Study of History*）巨製，世人多馳譽之。然湯氏著書造端，為發見保加利亞農民所戴之狐皮帽子，為希臘都突司所描敘波斯王軍隊所戴帽子之遺，遂明人類文明之遺產實橫亘古今，亦可謂無間古今。此新史學氣象之所以需要史家之能反照與前瞻者也。左君此書雖論馬遷與中國史學之源流，其所以詔西方學者，則不惟言史記在中國史籍中之地位，亦表示著者對目前史學者及西方學人治中國歷史者所抱之態度。其心胸中恆以馬遷之崇高地位與希臘史家希臘都突司在西方史學中之位置相比況，推其意固深望今日之西方史學家亦能踵西方史家反照之態度，而勿以近六、七十年所謂中國學之寥寥成就為滿足也。其意倘在斯乎！

作者於並世諸賢之著述，頗嘗引顧頡剛之書。顧先生於近歲印行之《點校本二十四史》，貢獻頗大。然其用新式標點印《史記》，民國廿五年（1936）北平研究院排印顧頡剛、徐文珊《標點史記》一百三十卷已肇其端。顧先生早歲以治古史名，其《古史辨》第一冊之長序，A. W. Hummel 嘗英譯為《一個中國史學家的自傳》（*The Autobiography of A Chinese Historian*, Leiden, 1931），以為現代新史學之趨向。其時顧先生之特識，即所謂一個累積式的古史觀也。其後顧先生為一九三六年排印本《標點史記》撰「自序」，於其過去研究古史之態度頗自懺，畧云：「去今十四年許，予放論古史，頗蹈譁世之譏。雖至今日，猶有堅持而不肯舍者，顧發難之初，無多備據，瑕隙昭然，每一回思，未嘗不面頰而心悸也。」又言「夫不施沈潛之功而突覲高明之舉，此必潰之術」，其自抑如是。又謂「《史記》一書，「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實為吾國史事第一次有系統之整理，司馬氏既自道之矣。後世史家或仰茲高閣，或化厥成規，支流縱極駁，導源則靡不於此。是書固亦有其甚多之誤漏在，然其誤後人可得而正，其漏後人可得而補，獨其創定義例，兼包鉅細，會合天人，貫穿今古，奠史學萬禩之基，煒然有其永存

之輝光，自古迄今未有能與之抗顏而行者也。』其言竟何似左君此書對史遷之推崇與嚮慕也！雖然，顧先生爾時之治史，尚不過受五四運動以後整理國故之影響，如依前引錢賓四先生《國史大綱》《引論》所言，則所謂考訂派也。左君之研史記，則先從綜合入手，由綜合全貌而漸入於分析，又經過分析之後再歸納其結論與心得，而有所謂第二次之綜合，與唯知概括節畧粗枝大葉者異。又如清人治學，更有所謂義理、考據、詞章之分。其實義理倘不指狹義之宋、明理學，凡可讀之文字而無義理者寡，而考據文字之有義理且文采斐然者，則三者悉備，此三條件不過為代表重要文辭之三方面。準是而言，昔人如歸震川（有光）、方望溪（苞）、吳棫甫（汝綸）之以評文學之觀點用朱墨圈點《史記》，亦不得謂其舉無是處也。斯義蓋不止《史記》如是。如希臘史家普魯他克（Plutarch，約公元46—119以後）所著之《列傳》（*Bioi Paralleloi*），其書於1559年為 Jacques Amyot 譯為法文，影響蒙田（Montaigne）之《散文集》（*Essais*, 1580-88）至巨。其英譯本則為1579年 Sir Thomas North 就法譯而成 *Lives of Noble Grecians and Romans*），用所謂伊利沙白散文體，其文句更多為沙士比亞各悲劇所吸收，研究蒙田與沙翁之關係者（如 G. C. Taylor, J. M. Robertson）類能言之。則西方史學著作亦奚不文學也？左君之論《史記》，亦不喜清儒學問為三科之說，愚故試引西方成例為之說，並見其所論史遷所長之大。左君之書，雖能為西儒之研《史記》治史學者進一解，然讀書之要，文字為尚，要在善屬書離辭，非期年揣情摩意可以為功者也。雖然，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今之羣賢果有變心易慮不以左君之言為洸洋自恣以適己者乎？其必有能觀往者得失之變而為後昆開一坦途者矣。

左君此書，一發凡造端希望能引起讀者普遍注意與共鳴之書也。故雖屬專門之學，其於時賢著述所流露之態度及意見，亦多委婉不苛。如《戰國策》之英譯或作 *Stratagems of the Warring States*, stratagem 又或作 intrigue。前者荷蘭治漢代歷史之何四維教授（Prof. A. F. P. Hulswé）已指其未能盡原名之長矣（見其大著“Notes on the Historiography of the Han Period”，收 W. G. Beasley & E. G. Pulleyblank (ed.): *Historians of China and Japan*, Oxford, 1965, p. 33, note 15），左君更言策字直是簡策之義，質言之，即文件而已（p. 42, note 28）。無錫錢賓四先生近世史學名家，所著如《先秦諸子繫年》、《史記地名考》俱與史遷之書攸關，而其他著述如《中國史學名著》，左君亦深折服。然於後者，則微惜其敘述《高僧傳》部分似病簡畧，而於文苑、藝術傳中人尙未包羅（p. 80）。簡陽王叔岷先生近歲著《史記輯證》，用力甚勤，左君極為重視，然謂如《莊子》哲理寓言之書，《史記》卷六十三「老莊申韓列傳」固言莊書乃「詆訛孔子之徒」者，是以《史記·伯夷列傳》言顏回「屢空，糟糠不厭，而卒蚤夭」，而莊書所載與之乖異，蓋所謂剽剝儒、墨者也，或不足悉引為校讎之資，不如存疑（p. 243）。《史記》最後部分之七十「列傳」，其體例不易確明，故各家詮釋或翻譯《史記》者，於列傳一詞之解釋，亦未能統一。法國沙腕（Chavannes）譯為“monographies”，美國華茲生

(B. Watson) 或譯作“memoirs”，或譯作“biographies”，然於列傳之『列』字何義皆無說。李克曼教授(Dr. Pierre Ryckmans) 嘗著「《史記》中列傳一詞之新解釋」“A New Interpretation of the Term *lieh-chuan* in the *Shih-chi*”(見 *Paper on Far Eastern History* 5, Canberra, 1972, pp. 135—147)，立一新說，以爲『列』字與『例』、『烈』之音近，史遷之意，或在表彰賢能。左君之書於此稍加論評，引「伯夷列傳」『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一節，《史記》卷七十四「孟子荀卿列傳」述騶衍部分云「先序今以上至黃帝……」，『先列中國名山大川……』及述荀子部分言『序列著數萬言』(p. 50)，皆所以證明傳統之舊說，如「伯夷列傳」司馬貞《索隱》云：『列傳者，謂敘列人臣事跡，令可傳於後世，故曰列傳』，張守節《正義》云『其人行跡可序列，故云列傳』，概可爲之補充者也。愚按《史記》列傳之體製匪一，或以其性質相同而同列者，如「刺客」、「循吏」、「儒林」、「酷吏」、「游俠」、「佞幸」、「滑稽」諸傳是也；亦有以地理相近而並載者，如「南越」、「東越」、「朝鮮」、「大宛」、以及「匈奴」、「西南夷」之屬是也；至於仁聖賢人或單傳，或雙傳，或一傳多人，亦皆悉自爲法，未必有成規可守。英國推徹教授(Prof. D. C. Twitchett) 著“Chinese Biographical Writing”(亦收 *Historians of China and Japan*)，亦言《史記》之列傳爲草創之局，然或有與之相近之素材爲之本(pp. 95—6; 左君書 p. 52 曾引其文)。此持平之論也。「伯夷列傳」史公云『余悲伯夷之意，睹軼詩可異焉』，其下緊接『其傳曰……』之句，《索隱》固以爲『其傳』指《韓詩外傳》及《呂覽》，茲不暇詳說。雖然，列傳一詞之含義，左君則僅引《史記》原文，而不更費辭。其實左君所引之處外，如「蘇秦列傳」史遷謂蘇秦幾成後世一所謂「箭垛式」人物，『異時事有類之者，皆附之蘇秦。……吾故列其行事，次其時序，毋令獨蒙惡聲焉。』似列傳之『列』當爲序列之意，一如《索隱》、《正義》所言。然即以列傳之首「伯夷列傳」一篇論之，史遷一則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舉世混濁，清士乃見』，再則曰『同明相照，同類相求』，謂『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巖穴之士，趣舍有時，若此類名堙滅而不稱，悲夫！』「伍子胥列傳」史公又悲若子胥從父奢俱死，何異螻蟻，而稱子胥『隱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是史公亦非無意於以諸列傳爲天下儀表者。又按「司馬穰苴列傳」太史公曰『世既多司馬兵法，以故不論，著穰苴之列傳焉』，則列傳之稱當爲一複詞，其體製或誠如司馬貞、張守節所論。若謂其作用爲表彰賢能，如上文所舉之情境言之，似亦非標奇之論也。(愚前引希臘史家普魯塔克《列傳》*Bioi Paralleloi*，其製亦有單傳、雙傳序列希臘與羅馬之軍人、立法者、雄辯家、政治家，如史遷之所謂『同類相求』者。東西遙隔，事固不相侔，惟史家之用心或可資比較。)書缺有間，學者無以發明序其旨意，左君之所守，蓋其慎焉。

前引劍橋大學推徹教授所著「中國之傳記著述」一文，其下列一段嘗爲左君所徵引，云：

中國和西方文學的另一個有意思的分歧是，西方古典觀念中的悲劇，個人面對環境而產生的困難遭遇的一種絕端的藝術表現，在中國的作品中卻找不到和它相類的東西。這對傳記的內容不無關係。因為悲劇和悲劇的傳統對西方的傳記一向有深刻和持續的影響，它們對讀者提供了一種態度，從那兒他得以觀察傳記的當事人和他所遭受的環境力量之間的關係，並且幫助了讀者使他能夠把興趣凝聚在當事人的個人本身。悲劇的傳統又對西方讀者對傳記的形式、連續性、和定型所要求的很高的價值，負有頗為重大的責任。這種傾向，到今天在歐洲傳統中的作者們還看做是本能一樣的東西，可是在中國卻沒有什麼反響。對西方讀者來說，所有的中國的敘述文字的渙散不相聯絡和插話式記載的性質，不論是小說或史傳，都和西方作品很不一樣。（原書 p.110；左君引見左書 p.53，引文中偶有小誤，如原文最後一字為 reader，非 research。）

推徹教授所指中國敘述文字以西方傳統之觀點言之多不聯貫及重插話式記載之特點，即《史記》亦往往有之。蓋中國傳記之體裁不止一端，而史傳中之記載自史、漢以降乃其最正式者，宜其矜慎。又古人言三不朽，其嘉言懿行為人所欽仰者，有時而一言一行一事為已足。《史記》言「未觀厥容貌則論言」（「仲尼弟子列傳」），固虞其過實損真，有時又或以「其書世多有之，是以不論，論其軼事」（「管晏列傳」），則正推徹教授所言插話式之記載矣。雖然，此愚燕陋之言，未必輒有當於理解史學之演進也。左君書 p. 56 則引普魯他克《列傳》所述之「亞歷山大傳」之「前言」以說之。其言曰：

這一部書所包含的是亞歷山大王和該撒皇帝的傳記，只有龐貝(Pompey)的事蹟可以跟後者相埒。面對着亞歷山大和該撒兩人充滿了行動的事業，我只可以在序言裏向我們的讀者做下面的請求。我期望他們對我敘述這兩人主要地只是寫了些簡畧的事蹟，而沒有把關係他們的每一件歷史事情詳細地加以敘述，能夠約束自己一下而不加批評。我是一個寫傳記的人，不是一個歷史家；我覺得人們最輝煌的成就還不是說明他們有足以為善或為惡的最好的例證。一件微小的偶發事件，一句話的說法，甚至一些戲謔，這些卻往往比屍體滿佈的若干戰場，無窮盡的威武的列陣，和被包圍的許多城池更能夠顯露性格的真相。畫家們用面部和眼睛的表情去表現他們所見到的形貌；因為只有這些地方纔是這個人物的清楚的寫照，所以對身體的別的部分他們就不發生甚麼興趣。在同樣的情形之下也許我也可以為人原諒如果我為一個人作傳僅著重於刻畫那最足以顯露這個人的個性的若干特點，而讓別人去處理那些大場面和戰場的情形。

普魯他克《列傳》之寫作時代與《史記》較近，左君之言，殆可以托襯出史遷如此寫法之癥結，未可謂為第為古人解嘲也。推徹教授又言中國傳記敘述缺乏西洋史學之悲劇傳

統，此點以前他人亦嘗辨論及之，如王靜安先生（國維）以《竇娥冤》為中國悲劇之上乘，惟所言未嘗涉及史傳之文字而已。愚按西洋之悲劇，肇自希臘諸大家。第就希臘作品而言，其主角常在入、神之間，死雖悲苦，然死乃出甘願，故其悲烈所以感動後人者乃益甚。死者長已矣，生者復如何，故此死的選擇亦正所以說明當時之社會條件、宗教意義，以至法律之社會的意義，不止如若干現代作品之僅強調主角之個性也。（如《史記·項羽本紀》言羽寧自刎烏江不願見江東父老，除性格外，其念頭亦與其家世及個人之責任感有關。其死亦是一種甘願之選擇也。「田儂列傳」記田橫乘傳車至離洛陽三十里處，告其客以不願見漢高帝之原因，然後自刎亦此類。史遷列其事，而言「無不善盡者，莫能圖」，則《史記》所能圖者，正此種特殊之境耳。）沙士比亞之《哈謨萊特》(Hamlet)，其悲劇之焦點為王子對國家之責任，對嚴父之責任，與其本人之性格間之衝突；《李爾王》(King Lear) 之衝突為一人而兼國君、父親及老人之特定的性格無以自拔，總之，皆以責任、道德及個人在家庭或環境中之地位為悲劇性格之主題者也。希臘悲劇中多涉及命運或神的安排，其人、神交通之處，中國古代文學作品中惟《離騷》及《楚辭》中若干其他部分之內容或可與之比擬。然《楚辭》之宗教信仰係中國古代南方之一種巫覡活動，其事至後世尚有遺痕，他處如朝鮮、日本、西伯利亞若干薩滿教(Shamanism) 蓋亦其類，實與希臘之宗教信仰殊科。中國史傳或文學作品中無希臘悲劇之傳統，殆不足異也。雖然，希臘悲劇中所播敘之自然或神之秩序受顛倒錯亂而致禍殃之理念，則在中國史家或文學家之觀念中亦常有之。此蓋人類心目中之普遍的觀念，窮則呼天，非希臘民族或受其影響之歐洲作品所獨抱者也。中國史家之例，漢代以來史書中之五行志、及《春秋繁露》以降之託變異言與革之說者史籍已具。文學作品中，如前舉之《竇娥冤》，竇娥被誣死前以三事為警告（六月飛雪即其一），正漢代今文家所謂五行錯變之說流傳民間相承不墮之一例也。（讀者試檢《三國志通俗演義》第一回即多見相類之事，皆上承古代之記載，非悉出元、明人杜撰。）惟歐洲之希臘悲劇傳統沿至後世，遞嬗演化，更益以哲學家之新要求，如黑格爾主張悲劇為一倫理事物之衝突，悲劇主角生前之要求為片面的、部分的，雖似可行而不得實現，此即所以引起衝突之原因，至其人死後，其要求始為人所了解，而獲得妥協。其說蓋與黑氏所倡之正、反、合辯證理論相符。然與此說相反者，如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 1844—1900) 推衍叔本華(Arthur Schopenhauer, 1788—1860) 人類之行動實為盲目的而非理性的之說，正直與無辜者終須受苦，遂謂悲劇為人類與生俱來之一種必需的無可避免的犧牲。踵此而後，近世作品之以悲劇為個人與社會間之衝突者，或以悲劇為制度與個人之衝突者，或就悲劇人物之抽象的定型而加以描寫者（如存在主義者一派之悲劇），實繁有徒，不可枚舉。凡此皆上承希臘悲劇傳統之緒，雖或者亦不免予中國現代作品以若干程度之影響（如學者謂曹禺先生之《雷雨》即有希臘作品之影子），然非可以語於中國史傳傳統之本身者耳。

若僅就一般史學及文學作品之大體言之，則悲劇即在歐洲亦有時間之異而其定義因而不同，吾人固不當完全以後人之想法衡量古人，若更移此理論以觀察中國古代之史學，吾人自亦不宜僅以一地之想法而衡量異地。蓋不僅異代不同時，即不同之地域，其歷史背景、生活習慣、社會、制度、禮俗、風尚，亦舉目有山川之異也。雖然，史學之觀察與討論固人類通性之一部分，吾人亦當於異中求同，或同中求異，如愚前文所言湯恩比君注意人類文明遺產之橫亘古今，則謂中國古代史傳中之敘述絕無述近似希臘悲劇傳統之文字，亦為未的。左君書中舉《史記·淮陰侯列傳》為例，謂讀者苟用此傳之德文譯本共席勒(Schiller, 1759—1805)之悲劇《瓦楞斯丹》(*Wallenstein*, 1800)相比較，即可見《史記》記敘之美，不亞於席勒最著名之悲劇(pp.54—55)。愚按淮陰侯韓信為楚漢之際漢之大將，高帝遇之厚，故雖經武涉、蒯通兩次勸其反而不聽。後怨望謀畔，不幸被絀就禽。瓦楞斯丹(1583—1634)係歐洲史中神聖羅馬帝國腓地南二世(Ferdinand II)之大將，兩任統帥，威震一時，亦以功高謀反，事窮智困，墜陷無道，最後為人謀殺；東西史實不無相似之處，而席勒雖文學家，亦史家，嘗著《三十年戰爭史》(*Geschichte des dreissigjährigen Krieges*, 1791—93)，是以對於瓦楞斯丹之事蹟，所知彌切。雖然，《史記》中所敘述人物之環境及性格，饒有歐洲文學之所謂悲劇性成分者，淮陰侯信外，亦不乏他人。如屈原寧赴江流而葬魚腹，史遷以為推其志可與日月爭光；項羽之刻畫栩栩如繪，其失敗固由其個性，其為人所追慕亦由其個性；「魏其武安列傳」以敘述之戲劇性言之，固可衍成沙翁悲劇式之劇本，而李斯之曲從趙高，仰天而歎，垂淚太息曰：「嗟乎！獨遭亂世，既以不能死，安託命哉」，亦見其非不知其害，而終於不能不作此於己不利之選擇，蓋亦有極濃郁之悲劇氣氛者也。如不以體製之形式及文字之短長言之，若「淮陰」、「項籍」、「屈平」、「李斯」諸傳，或亦有微當於自希臘悲劇至文藝復興時期劇本之所謂描寫一個巨人之死者矣。

左君之書正文幾三百頁，並書目、索引則三百五十餘頁。於同類著作中，可謂哀然巨製。其譯文字斟句鍊，期在典雅，亦頗有能糾正時賢微失之處。如譯「太史公自序」，史公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紲，「乃喟然歎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毀不用矣。』」一節，本書頁134引華茲生譯文(*Ssu-ma Ch'ien: Grand Historian of China*)云：

“Such is my fault, such is my fault, that I have brought mutilation to my body and may never again serve my lord!”

左君此處之譯文則為：

“Est-ce vraiment ma faute? Est-ce vraiment ma faute? Ce corps ayant été mutilé, je ne pourrai plus être utile.” (p.148)

則知華氏之文有增飾處，仍不及左君之中肯。上大夫壺遂言孔子上無明君，下不得任

用，故作《春秋》。「今夫子（指史公）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以何明？」此一段問語問得名正言順，史公極不易回答，然又不能不說明己意，故觀其語氣，「唯唯，否否，不然」六字已極見其欲說還休，口欲言而囁嚅之情狀。六字亦極難翻譯，左君譯之為“Oui mais…mais, non, telle n'est pas tout à fait ma pensée.”蓋神來之筆，頗似近年法國總統 Valéry Giscard d'Estaing 未上臺前最後一次對戴高樂政策表示之名言“Oui…mais”，可謂古今相映成趣。其譯「報任少卿書」『故且從俗浮湛，與時俯仰，以通其狂惑』為：

Je ne puis que me laisser surnager ou couler suivant la vague, abaisser ou élever avec le temps, pour donner une issue à ma rage et à mon embarras. (p.1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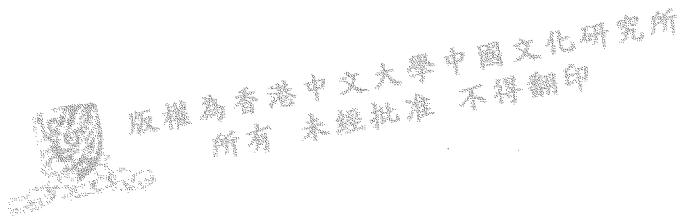
文字已頗洗鍊。譯者更引歌德《浮士德》下列數語為註，以通其意：

In Lebensfluten, im Tatensturm
Wall ich auf und ab,
Webe hin und her!
(在行動的狂潮裏生活像潮水的漲落，
我上下浮蕩着，
我順流進退。)

類此之處，讀者或以為信手拈來，得來全不費功夫。不知譯事之難，尤在銖兩相當，不枝不蔓，亦不可露斧鑿痕。若左君之所造，文從字順，非於此道三折肱者不能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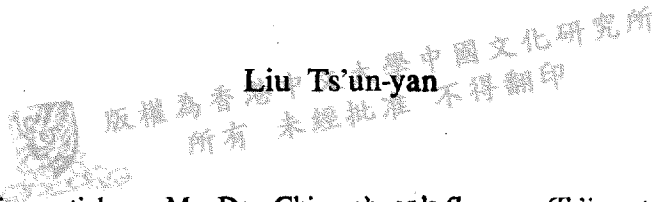
海外刊書，其漢字部分常多訛誤，校對亦往往顧此失彼。本書誤印之字匪多，惟司馬遷之名字法文作 Sseu-ma Ts'ien，全書皆不誤，惟封面則 Ts'ien 誤刻為 T'sien；頁 70 之陸遊，遊當作游；頁 172 之桓談，談當作譚；頁 209 之候康實為侯康；頁 293 之左邱明實為左丘明；頁 315 之應邵當為應劭。又頁 248 之要籍題解當為要籍解題，皆誤字之僅見者。頁 177 攀峻名字之拼音當作 Tche Tsiun，非 Tche Ts'in。再版時似可校正，然皆無損於全書之涉獵廣博，修明條貫，及作者馳騁上下古今數千年間，辨章學術，原始察終，述往思來之雅懷也。

一九八〇年四月，於坎培拉。



On Dzo Ching-chuan's *Sseu-ma Ts'ien*
et l'historiographie Chinoise

(A Summary)



Liu Ts'un-yan

This review article on Mr. Dzo Ching-chuan's *Sseu-ma Ts'ien et l'historiographie Chinoise* tends to give the academic justification for needs of publication of such a work, which has highlighted the importance of comparative historiography in general, and the usefulness of analysing the contents of Ssu-ma Ch'ien's *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 (Shih-chi)*, in the light of modern Western scholarship in particular. In Mr. Dzo's original work, he points out some of the weaknesses of earlier, or contemporary scholars, Western or Chinese, in their studies of the *Shih-chi*, and has made a number of corrections, apart from giving some additional advice. The writer of this article, while elaborating and echoing some of the views already indicated by the author of the work, has enlarged his vista to the extent of reviewing the thoughts of modern European historiography from the early times to the present, so as to strengthen the author's enviable position as a scholar who has been engrossed in the study of Western Classics for several decades, yet has a sound traditional Chinese scholarship.

